

12/92

HONG KONG POLYTECHNIC

九龍城砦的居民

喬健、蘇崇尹、林進光、
梁礎安於一九八九年三月

緒言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香港政府宣佈將於一九九〇年把九龍城砦清拆並在原地興建公園，中國政府外交部隨即在北京聲明表示對這一決定充份理解。於是這個聚集了五湖四海人士，爭論了將近百年的畸型社區瞬將煙消雲散，成爲歷史了。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香港研究中心發起一集體研究計劃。乘著在未清拆前，對九龍城砦緊急作些研究與紀錄。喬健率同人類學系三位研究生：梁礎安、蘇崇尹與林進光參加了這一計劃，對九龍城砦的居民作了一些粗淺的調查。這調查著重於三個問題：(1)居民所從事的行業與砦內的工商業，(2)居民的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爲，(3)居民所屬族羣與各族羣間的關係。

在中大歷史系研究生陳津華先生熱忱的嚮導下，我們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對城砦作了第一次訪問。訪問之後，我們詳細地作了檢討，擬定調查大綱與步驟而且分配了工作：由梁礎安專注上述第二個問題的調查，蘇崇尹與林進光共同負責其餘兩個問題的調查，喬健作總的指導與協調。這以後每週聚會一次比較與檢討調查結果。如是者十三週，由於暑假屆臨，各人都已另有計

劃，只得將調查結束，開始撰寫報告。撰寫方面梁礎安仍負責有關第二問題的撰寫構成報告的第三章「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為」，林進光負責其他二問題撰述構成報告的第二章「服務與製造業」及第四章「族羣與族羣關係」。我們原想尋找數位久居城砦的人作幾個生活史，但因時間的短促及實際訪問的困難只作了一個，由蘇崇尹寫出作為第五章「一個城砦人的經歷」，蘇崇尹同時也負責撰寫第一章「概說」。喬健則作總的修訂，並撰寫「緒言」。除了文字的報告外，我們還拍了大量的幻燈片，並從其中選了二九〇張製成兩輯分別存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及社會研究所香港中心作永久性的保存。

通過上述文字報告與幻燈片，我們希望能把九龍城砦的面貌與活動紀錄下一部份來，但由於調查時間太少，我們所紀錄的實在是鳳毛麟角而已。然而即使如此，九龍城砦清拆之後，這個報告與幻燈片，都會成爲它歷史的重要見証，隨著歲月的逝去，它的價值會愈來愈珍貴。

從我們有限的資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城砦的主要居民是客家人與蛋民。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轉移，大批人口湧入香港，城砦吸納了不少經濟情況較差，尋求低廉租金房屋的新移民，於是在五十年代，城砦變成了族羣社區，沒有一個佔絕對優勢的族羣。

六十年代移民大量增加，城砦樓宇供不應求，原來的木屋及三層高的樓房紛紛改建高樓。這些建築商主要是潮州人，他們與有土地的城砦居民協議，高樓建成後以一定比例給予地主作爲交換。潮州人因而擁有了不少樓宇，透過他們有效的社會關係網，大量潮州人入住，很快就成爲城砦內主導族羣，加以他們所經營的商店與工廠多傾向僱用潮州人，因而增強了這主導優勢。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由於其經濟情況改善，居住於城砦內潮州人紛紛搬出，城砦於是又漸恢復多族羣時代的情形。

上述的變化的過程在第二，第四及第五章中都有較詳細的討論。我們覺著城砦好像是個小的實驗室。由於經歷的年代短，人數少而集中，所以極易作控制觀察。這個實驗室所展示的現象，我們覺著也許可以用來解釋一個華人移殖史上很重要的問題：爲甚麼閩南語系（包括潮州話）的華人在東南亞各地如菲律賓、泰國、馬來亞、新加坡……甚至早期的台灣能在當地衆多華人族羣中成爲主導族羣？城砦的例子顯示在法律秩序缺乏或鬆散的社會裡，閩南語系華人固有的強大社會關係網能發揮極大的適應功能。我們覺著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發現。

本報告全部調查經費承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資助，調查期間承香港政府新聞署派駐九龍城砦專責事務小組人員及九龍城砦福利會予以方便及提供資料，吳倫寬霞博士及陳津華先生熱情協助，訪問工作得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羅志雄、李美樺、余彩蓮、陳穎芝、許淑萍諸同學熱心參加，何錦賢先生協助設計問卷，曾展嫻小姐爲本報告作中文電腦打字，對於我們的調查，不少城砦居民跟我們密切合作，熱忱協助，令我們的調查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謹於此一併誌謝。

甲、概說

一、地理位置

九龍城砦位於九龍半島九龍灣附近白鶴山南麓，屬九龍城區。一般居民認爲城砦範圍包括東

正道、賈炳達道、聯合道及東頭村道以內的地域，但根據香港政府的官方界定，九龍城砦界址北迄東頭村道，南至龍津道；東邊以龍城路為界，西邊則止於西城路。城砦全長二四〇碼、闊一三〇碼，面積約為六·五英畝（即二·六公頃）（註一）。

九龍城砦內有六條比較主要的街道，分別為南北對走的龍城路、光明街、老人街、大井街、西城路、以及東西對走的龍津路。城砦內的橫街窄巷則分別以這六條街為主幹向四周伸展。

二、城砦簡史

九龍城砦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當時香港沿岸盛產食鹽，於是南宋朝廷便在港設置了「官富場」來管理鹽政。公元一一九七年（宋慶元三年）宋三百水軍進駐香港以防私梟作亂。這批水軍在「官富場」附近的白鶴山開石建寨，名為「官富寨」。

元明兩朝，「官富場」改稱為「官富巡司」。

清康熙遷海期間，令九龍沿海村民內遷，並在九龍村山上設墩台作監視之用。

清乾隆年間，砦內駐守的海兵依宋時石牆舊址重修城砦，並改稱為「官富九龍寨」。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因鴉片戰爭失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道光二十六年經兩廣總督耆英上奏，清政府為鞏固前線防守力，再次修葺城砦內牆，並加建外牆，城內長二四〇碼、闊一三〇碼；牆高約七碼，厚一·七碼至四碼。二十七年城牆修葺完工，南邊正門上刻有「九龍砦城」四字。並採用移民實邊的政策，招徠各地農民入城居住，及開墾城外的荒地耕種。一八六〇年清政府再跟英國簽訂北京條約，定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撥歸英國管治。一八九

八年，清政府與英國又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一八九九年為期租借新界予英國，唯專條中訂明：

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所租之地專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

根據專條，城砦仍為清政府所有，而當時城內尚有駐兵百多名留守。一八九九年英國官員入城點算人口，得城內居民約五十戶，人數二百。居民多以漁農為主，間有從事泥水，土木等行業。

簽訂專條至日治期間，香港政府曾先後三次清拆九龍城砦，時間分別為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三年城砦內尚有民房四、五十戶，一九三六年清拆後，城砦內只剩下衙門、義學和三十九號門牌的曾生石屋。

日治期間，不少城砦居民退回大陸避難。一九四三年日軍下令拆去城砦城牆磚石，用以修建啟德機場。拆去城牆後，城寨的界線便日漸模糊。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原有的城砦居民陸續返回城砦重建住屋；另外，亦有大批內地人士湧入香港定居。密密麻麻的木屋紛紛堆建在城砦的菜地上。一九四七年港府發出遷拆通告時，城砦內有居民二千多人，較戰前人口多出十倍。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港府清拆城砦三十多所房舍時發生警員與城砦居民對峙和衝突。城砦

居民向中國政府求助。經廣東省官員與港府交涉後，港府暫緩清拆工作。爲了反對港府的清拆行動，城砦居民組織起「城寨居民聯合反對拆遷委員會」，該會即今日「城寨街坊福利會」的前身。

令到九龍城砦面貌改變的原因，除了港府大規模的清拆之外，更主要的倒還是火災和城砦內人口急劇的增加。九龍城砦曾先後發生過多場大火，其中以一九四九年大火災和一九五二年龍津路火災兩次的損毀最爲嚴重。除了大火災之外，城砦還經常發生火警意外。火災之後，居民隨即重建起新房屋。

城砦人口的急劇增長始於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後，更有大量人士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至六十年代，城砦人口已躍升至二萬多人，約爲戰前城砦人口的一百倍。一九八二年城砦福利會所作的城砦人口和戶數抽樣調查統計，發現當時城砦人口已急升至四萬多人，即戰前城砦人口的二百倍。這一羣新增加的城砦居民大部份都是大陸來港的新移民。由於城砦內地少人多，建築商和城砦業主便紛紛把舊房子改建分租或賣給新居民。五十年代城砦的屋宇，一般都是一兩層高的木屋，間有少量兩三層高的石屋。到了六十年代初，便開始出現五六層高的混凝土樓房。六十年代後期起，屋宇都向高空發展，不少樓房已改建爲十一、二層高的大廈。七十年代更加建至十四、五層。但由於鄰近啓德機場，城砦樓宇的高度必須受到限制，所以今日城砦樓房都維持在十四、五層高的極限。因爲地少人多，又加上在樓宇建築時並不受政府的監管，城砦居民爲了盡量增加樓宇面積，在改建樓房時，都佔用了街上的空間，結果造成樓宇與樓宇相接連，街道亦因而

縮得很窄。

自四十年代中期開始，大量原居於中國大陸的人士紛紛移來香港。社會上住屋短缺，樓價及租值迅速提高。因爲在城砦購買樓宇並不需要繳差餉、地稅、物業稅，而且在樓宇買賣時律師費、厘印費亦可省回，所以來港新移民和低下階層的市民，限於經濟入息低微，便搬進城砦居住，以較低廉的價格購買或租賃樓房安身或養老。由於城砦內樓宇租金和售價低廉，加上不受政府各種條例的監管，所以除了住家之外，不少的小型作坊及工廠亦紛紛搬進城砦之內經營（註二）。

城砦居民雖然可以節省不少稅務開支，但他們亦因此失去享有一般的市政設施和服務。其中包括自來水的供應、衛生服務、城砦內街道的維修和街燈照明等等。現時部份工作由一九六三年成立的城砦街坊福利會負責，而用水方面，城砦居民則聘請供水商打井供應。

城砦過去不受香港政府所管治，所以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黃、賭、毒等不法的活動便紛紛在城砦出現，而且當時城砦內幫會林立。到了八十年代，城砦內的各種非法活動才因爲警方的積極干預而收斂。隨著香港整體社會的都市化和現代化，九龍城砦亦日漸同化於城砦外的社會，再加上急劇的人口流動，城砦內外的差異更日漸拉近。

城砦作爲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終於在今日獲得解決。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港府在徵得中國大陸政府的同意後，頒佈九龍城砦的清拆計劃，並同日進行清拆登記，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式清拆九龍城砦。

三、城砦現況

根據香港政府的估計和城砦福利會的抽樣調查，城砦在進入八十年代之後，人口一直維持在三、四萬人之間。近幾年人口則有逐漸下降的趨勢。根據香港社工訓練學院在一九七五年的一份調查，發現城砦內平均每戶六·五七人，平均每戶面積五百至六千方呎，其中半數為自置物業。而根據城砦街坊福利會一九八二年所作的調查，統計當時共有一萬二千多戶，人數約為四萬，平均每戶約有三人。兩個調查數字互相比較，可以發現雖然城砦人口數目變化不大，但家庭內的人數和結構則有頗大的轉變。每戶平均人數下降的原因有二：第一，原先在五、六十年代遷入城砦的居民都有較多的子女，隨著這羣年青人的成長和結婚，他們都搬出城砦外另覓新居，家中人數因而減少。第二個原因，是在八十年代開始，城砦不斷吸納剛抵港的大陸單身移民，經過平均計算後，每戶人數便有所下降。

從前在城砦居住的主要是客家人和本地人，但在五、六十年代開始，便有大量潮籍人士搬入九龍城砦居住或經營生意。他們搬入城砦，主要是透過已經居住在城砦的同鄉介紹。他們操同一的方言和進行同一的宗教儀式，在城砦內，潮籍人士之間會有較多的接觸。對於較貧窮的新移民來說，這一種同鄉之間的照應與幫助對他們適應新環境十分重要。

據各方面的調查和我們的觀察所得，城砦居民大都屬於較低下的階層，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多數是紡織、製衣、五金、塑膠和酒樓飲食業。只有小部份的城砦居民是在城砦內工作，大部份的居民都是在城砦外就業。城砦內居住的青少年和兒童亦差不多全部在城砦外的學校就讀。這一羣

在城砦外工作的居民，早出晚歸，「城砦」對他們來說，只是提供一廉價居所的地方而已。

根據城砦街坊福利會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的調查，城砦內診所，店舖和各種作坊、工廠合共七四五所。其中主要包括牙醫醫館（共九七所）、醫務所（共八九所）、塑膠工廠（共九三所）和各式商店（共七七所）。這些牙醫醫館、診所、店舖和工廠大部分佈於東頭村道（共二〇四所，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龍城路（共八六所，約佔總數百分之十一）以及龍津道（共七〇所，約佔總數十分之一）。這些商舖、診所所在的街道都是城砦最外圍的街道，而他們服務的對象亦以城砦外的居民為主。另一方面，五金工廠和塑膠工廠則多設置在城砦的中央地區，例如光明街和大井街等等。然而，除了少量的雜貨店外，城砦內所開設的牙醫醫館、診所和各式工廠店舖，不論是設在城砦外圍，還是城砦的中央地區，它們的顧客都來自城砦之外。

在社區設施方面，雖然政府並無特別的安排，但仍然有不少志願組織，宗教團體和居民自發組織的社團出來為城砦的居民服務。

城砦街坊福利會，全名為九龍城砦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該會成立於一九六三年八月，由當時的城砦居民聯合反對拆遷委員會演變而成。該會在六十年代初及中期最強大，城砦內外大事均由該會出面調解。福利會有較強的親北京政府的政治立場，但由於近年來中英政府關係的修好，政治上福利會已不如從前活躍，轉而集中改善城砦內的社區環境，設置街燈、路牌、組織區內的康樂活動。另外城砦街坊福利會亦負責為城砦內樓宇買賣作見證。

青年協會九龍城青年中心，位於老人街，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成立，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城砦內

居住的青年，為他們提供康樂活動和溫習功課的地方。

中華傳道會在九龍城砦內設立了恩光學校和老人中心。老人中心和恩光學校的所在地即昔日清政府衙門。今日恩光學校已經停辦。但老人中心仍然負起提供老人社區服務的工作。老人中心除了為老年人預備各種的定期活動之外，亦提供了老年人平日休憩的地方。

另外，信安堂亦在九龍城砦設立會堂、學校和閱覽中心，為城砦內的居民服務。而信安堂的會址則設置於城砦外圍的西城路。

除了有組織的基督教團體之外，亦有不少基督徒單獨或以小組形式進入城砦服務，例如潘玲卓女士所組織的青愛中心，就是向城砦青年，尤其是一些曾有案底或有毒癮的青年傳道和進行福音戒毒。

城砦除了這些新興的社區設施外，仍然保留著不少傳統的社區設施和活動。這些設施和活動大都與中國傳統的宗教有關，而且一定程度上與城砦內的族羣特性有關連。

城砦內的廟堂包括有天后廟、天后古媽、福德廟，以及一所鶴佬人的宗教會堂。天后廟位於城砦東北方的天后廟街。天后廟是戰後潮州人大量湧入城砦定居時帶入城砦的。該廟只在城砦福利會登記，並不隸屬於任何外間的宗教團體。而進入天后廟拜祭的亦大都是在城砦內居住的潮籍人士，其他籍貫的城砦居民甚少進入該廟拜祭天后，而該廟的負責人亦是潮籍人士。

九龍城砦天后古媽的情況與城砦天后廟的情況相似。天后古媽位於東頭村道，亦是在二次大戰後由潮州人士帶入九龍城砦。而天后古媽的參拜者和廟堂管理人亦同為潮籍人士。但就規模而

言，天后古媽則比天后廟細小。

但就香火而言，天后廟和天后古媽都不及福德廟鼎盛。城砦內原來有三個福德，後來都集中在東正道的福德廟處供人參拜，所以現時福德廟內有三個香油箱。參拜福德的既有城砦居民，亦有城砦外的居民；既有潮籍人士，亦有其他籍貫的人士。

九龍城砦除了天后廟、福德廟之外，還有一所鶴佬人的宗教會堂。該會堂設於龍津路。平日甚少鶴佬人在會堂進行聚會，所以會堂的大門經常拉上鐵閘。門外的石獅亦被堆上雜物而無人清理。

九龍城砦每年最熱鬧的宗教活動，要算是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的孟蘭節。參加孟蘭節的絕大部份都是潮籍人士。他們所參加的多數是九龍城孟蘭勝會或東頭村孟蘭勝會。在孟蘭節前，孟蘭勝會會向城砦潮籍人士募捐以應付孟蘭節宗教儀式的開支。在孟蘭節當日孟蘭勝會會安排一場盛大的宗教拜祭儀式。完成各項儀式之後，孟蘭勝會會把一些如燈籠等的辟邪飾物送給曾經捐款的人士。

乙、服務與製造業

由於城砦的地位較特殊，以前且有「三不管」地帶之稱，很多香港法例都沒有在砦內執行。故此，很多廠家都喜歡到砦內開廠營業，一則，城砦內租金較砦外的便宜，再加上城砦不受諸如衛生條例、防火條例及勞工條例等法例的管制，故此很多設備可以較法例所規定的更為簡單，經

營成本因而減低；這些條件對於小本經營的行業來說，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

根據城砦街坊福利會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的調查所得，城砦內計有十三類行業，共有六四五戶店舖、工廠或作坊。由於我們這次研究工作的時間及人手均有限，故此不可能對這些數目多、分佈散的不同行業進行每家每戶的訪問。我們爲了工作的方便，只集中訪問城砦外圍街道的店舖和工廠。我們所以選取城砦外圍的街道，主要是因爲這些店舖通常都開門營業，比較容易接觸；反之，在城砦內部的店舖、工廠及作坊（除服務性行業外），很多都是閉門經營的。這些閉門經營的工廠、店舖均不願接受我們的訪問，故此我們只能轉移訪問的區域，找一些比較願意受訪的店舖、作坊作訪問。

是次調查主要是採用問卷及深入交談（Deep Interview）等方法。爲了工作方便，我們集中在與題旨有關的問題上，作問卷式的調查。但由於很多資料彼此之間是有相關性的，如只採用問卷調查則可能會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問題，所以某些問題我們採用比較彈性的方式，以閒談和開放式訪問（open-end interview）與被訪者交談。

是次調查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受到被訪者的拒絕，其次便是有些被訪者因某些因素不願提供較詳細的資料。城砦的醫生大都不願意接受訪問。診所一般都裝有鐵閘。病人來就診須先按門鐘，等裡面的醫生或護士看過按鐘者後才開門。每當我們探訪這些診所時，應門的護士問明我們的來意後便馬上表示拒絕接受訪問；多番嘗試後我們才找到一家肯接受訪問，在多次被拒後，我們只得放棄訪問診所。而他們之所以不願接受訪問可能是因爲他們所從事的行業較爲敏感。

另一種困難則是被訪的店舖、工廠內噪音太大，使到訪問無法順利進行，例如五金、某些食品製造業所使用的機器運作時發出的過量噪音，使得訪問受到影響。另外，當受訪者的店舖有顧客光顧時，亦會影響訪問的進行，甚至迫使訪問中斷，這情況以雜貨店爲最。而餐廳老板則通常以做生意爲藉口而拒絕受訪。

一、行業概況

是次調查基於人手及時間的限制，我們只能隨機地訪問了四十家店舖、工廠和作坊，並根據其行業性質分爲十類行業。

(1) 牙醫

據街坊福利會的統計，諸種行業中以牙醫爲數最多，而我們訪問的四十個個案中有十位是牙醫，佔總數四分之一。

被訪的十家牙醫，個人經營是他們的共通特色，一般都是牙醫自己一人負責一切工作、照顧舖面和顧客。除了個案五中的牙醫在較忙時會聘用一位散工外，其他九家均沒有聘用員工。個案五中牙醫所僱用的員工是他以前的學徒，算是有師徒名份，當牙醫的生意太忙，應付不來時，就會請他到店內幫忙。另外兩個個案中，牙醫的家屬間中會到店舖內幫忙做一些雜務，但並沒有收取薪金，故此不能算爲員工。個案二中牙醫的妻子，有空的時候會到店內打掃、煮飯和招呼顧客，至於較技術性的工作則完全由牙醫一人負責。個案十的牙醫跟從其父學得鑲牙和造牙技術並繼承其醫館。其父雖已退休多年，但每天早晨仍到醫館開門，幫忙招呼顧客，然而，主要的工作

還是由牙醫負責。

在牙醫這一行業中，被訪者大多是學徒出身的。除了個案四及八的兩個牙醫是在內地正式考入醫學院外，其他八人均是學徒出身。個案四的牙醫在內地時考進了湖北武漢區醫學院牙科，習醫六年，畢業後在醫院內任牙醫，隨後來港在城寨開始經營。個案八的牙醫在內地考入廣州華南醫學院，來港後在城寨營業。其他八位學徒出身的牙醫中，有三人是經朋友介紹學師的，（個案一、五、九）；一人是親戚介紹而習師（個案二）；其餘四人均是從其親屬學習，其中一人是跟姊夫學習的（個案三），另外三人是兒子跟父親學習（個案六、七、十）。

至於牙醫診所所在城寨開辦的年數方面，各有不同：其中不足十年的有兩家（個案四、六），十年以上，十九年以下的有四家（個案一、三、五、九），二十年以上，二十九年以下的有兩家（個案二、八），三十年以上的有兩家（個案七、十）。

問及店舖開辦時資本搜集的情況，有三家不願透露他們是如何集資的（個案四、五、八），其餘七家主要是以自資及借資兩種方式來開始他們的事業。自資是指資本來自牙醫本人或其家庭內的成員，自資的有四家（個案二、三、九、十），剩下的三家則是借資（個案一、六、七）。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個案十，該牙醫是繼承父親醫館的。他父親在一九五一年來港，然後自資在城寨開了現時的醫館。該牙醫在香港出生，中學畢業後隨其父親學習鑲牙、造牙的技術，數年前其父退休時，他便承繼了醫館。

受訪牙醫的居址方面，我們發覺除了個案六、八、十這三個個案外，其餘七位牙醫均住在城

砦外。由此可見這些牙醫大都只把城砦視為他們經營的地方。三個居於城砦的牙醫，除個案六的一位入住城砦的年數較短，只有六年外，另外二人都久居於城砦，一位住了二十年（個案八），而另一位住了三十多年（個案十）。這三人都是在開始於城砦經營醫館時就住在城砦直到今天。

(2) 商店

接受訪問的商店有五家。這五家商店最大的特色是其經營者均是夫婦二人，其子女亦間有幫忙。五家之中，個案十二夫婦的孩子比較年幼，上學下課都需要父母照顧，當店裡生意較忙時，他們便會請街坊鄰里幫忙。這些人不是長工，而且只是透過口頭的邀請，事後再給一些酬勞。

城砦的商店大都是店舖與住家在一起的。被訪的五家都是住在砦內，而且也都是在舖內居住。例如個案十一的商店位於東正道，是兩層高的石屋，店主將樓下作店舖；樓上作為住家。據他們說，平時生意就由店主夫婦兩人負責，以前孩子亦有幫忙，但因為現在孩子都長大了，有自己的工作，所以甚少再幫忙。個案十二的商店，由於店舖面積較大，所以就將店內一角辟作房間，夫婦二人與子女就在房間內休息。另外個案十五，店主夫婦沒有子女，兩夫妻一起生活、做生意。他們店舖的樓底較高，店主便架起一個閣樓，用一道木梯作上落之用，夫婦二人就在閣樓居住。

這些商店售賣的都是一般的食品、雜物，例如罐頭、糖果、酒水、麵包等，其中個案十二的商店更售賣米、油、鹽等食糧，其他四家則以賣糖果、汽水、酒等東西為主。個案十一中的店舖由於位於東正道大街，故除上述的物品外，還有衣服出售，這些衣物有女裝上衣、運動衣服和小

童衣物等。比較特別的是個案十五，雖然他們亦有賣糖果、酒水，但據老板娘透露，他們主要的收入並不是來自這些生意，而是來自顧客打麻將時「抽水」。他們的舖內有兩間用木搭成的房間，讓附近的街坊用來打麻將；他們除了收取麻將牌和地方的租金外，他們為打麻將的人遞煙茶酒水亦得到報酬。據說這兩個房間從開舖到收舖都經常「客滿」，而且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是一樣熱鬧。

商店的另一個特色，就是營業時間較諸其他行業的為長。他們大都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反之，其他行業都有較固定的開、收舖時間。例如牙醫，營業時間大都是早上十時至晚上十時。而很多接受訪問的店舖，營業的時間都是從早上八時或九時開始，直到深夜十二時，中間並沒有午膳或晚膳時間。這可能與他們提供的服務性質有關。一般來說，他們都沒有假期，全年營業，縱然農曆新年也不會放假，因為新年期間是生意最忙的季節，他們不會放假，平白放棄一個賺錢的機會。

在開辦店舖初期資本來源方面，除了兩家（個案十三、十四）資料不詳外，剩下的三家都是店主自己搜集資本，沒有向朋友或親戚借錢。原因可能是開辦商店的成本額不大，而且店舖也可以用作住家，故此成本開支無形中減少了很多。個案十一的店主今年七十六歲，他說自己在二十多歲時來香港，幫人「托米」托了兩三年，有了積蓄便在城砦開舖。個案十二的店主就比較不幸，一九七四年來港，初在地盤工作，意外斷臂後，得到公司一筆賠償，顧慮到沒有其他工作可做，於是就靠那筆貼債金在城砦開商店謀生。個案十五的商店在龍津路，店主夫婦原本是做藤椅

的，但後來生意及市道不好，於是就將做藤椅時所積下來的儲蓄在城砦買屋和經營商店。他們說經營商店的資本全是夫婦兩人所積下的儲蓄，並沒有向人借過錢。

店舖在城砦開辦時間方面，有三家在砦內已經經營超過二十年以上，他們分別是個案十一、十三及十五。剩下兩家只有十多年，其中個案十二的大約十四年而個案十四的則有十二年。

(3) 水電商

水電商，及指專為顧客安裝水喉、電器的店舖。這種「水電商」有別於城砦居民常稱呼的「供水商」。供水商是指那些開水井，供水給居民而收取費用的商人。據城砦街坊福利會在八三年八月的統計，砦內水電商共有十二家，我們則訪問了三家。

這三家店舖中，一家位於老人街（個案十六），一家位於光明街（個案十七），一家位於大井街（個案十八）。在僱用員工方面，個案十六的店主獨自經營，間中亦有僱用散工。個案十七中店舖的工作人員有三人，其中兩人是兄弟。兄長是店主，而弟弟是隨兄長入行並在其舖內工作，另一名員工是他們登報招請回來的水電技工。他們據說這份工作常要上門替人整理有關工程，覺得人手不足，所以登報招請員工。至於個案十八的店舖是兩夫妻經營的。店主租用上址只有一年多，以前他在大陸也是從事這行業，來港後入住城砦，儲蓄一筆資本後就租用上址作舖。店主的妻子八六年來港，只會說潮州話，不大懂廣府話，平時店主出外工作時，他妻子就留在店裡照顧一切。由於她不懂廣府話，所以店主的妹妹也常來店裡義務幫忙。

在籌集資本方面，資料比較詳細的是個案十六及十八，個案十七的則不詳。個案十六的店主

在七二年來港時便入住城砦，七八年進入電子工廠做工並學電器，工作五年後利用積蓄在城砦買了舖位開始經營。個案十八的店主也是透過工作自己儲蓄資本。

在店主的住所方面，個案十六及十八中店主都住在城砦的民房中；而個案十七的店主和員工都並非城砦居民。這種分別或可從他們店舖出售的物品見到。個案十六及十八的兩店除承接工程外，亦出售一些電池、電筒、電插頭等電器用品，個案十六的店舖更替人修理如電視機、收音機等的電器。而個案十七的店舖則明顯不同，他們舖內只有一些修理工具，並不出售電器用品。由此可見居於城砦內與砦外的分別，個案十七的店主只視砦為工作場所，而個案十六及十八的店主則將生活與工作連結一起。

在開辦時間方面，個案十六及十七兩店在砦內均只經營五年時間左右，而個案十八的則只有一年多。與其他行業比較，這些電器商開辦的時間方面比較短。

(4) 製麵業

是次調查共訪問了四家製麵店。在員工方面，除了個案廿一的作坊僱用較多職員外，其餘三家都只是一至二人經營。個案十九的製麵作坊單由店主一人打理整個店舖，而個案廿及廿二兩所則由父子二人一起經營。這兩個個案都是兒子跟父親學習造麵手藝後，繼續留在店裡幫忙。個案廿一的作坊店主僱用了三名員工，這三名員工均是他以前在砦外營業時的舊伙記，他搬入砦內後三個員工仍跟隨他一起工作。

受訪的四家製麵作坊的店主都是學徒出身的。其中個案十九及廿的兩位店主是跟親戚學習的，個案十九的店主跟他的老表學的，而個案廿的則是店主父親跟他伯父學藝後傳給店主，個案廿一的則是透過親屬介紹，店主與他師父並沒有親戚關係。個案廿二的店主從朋友處學會製薄餅後，傳給兒子。從這些跡象可見，師徒關係大都是建立在既有的社會關係之中，其中以親屬關係為主，其次是朋友關係。

在資本籌集方面，主要透過兩種方式：合資和自資，個案十九的店主在開辦時和幾個同鄉合資，但後來其他人都退出，剩下店主一個人繼續營業。個案廿一的情況與個案十九相似，原先由幾個朋友合資，合伙人退股後就剩下店主一人。個案廿二的店主原在錶面廠任職，後來透過朋友介紹而學會製造薄餅，十年前轉工，由於開辦新店只需一些簡單的工具，而且又以自己的住家為作坊，成本不大，所以店主能單獨負擔。個案廿的情況是父子二人一起工作。作坊是現任店主的父親所開辦，其父原先在一紗廠工作，後來才跟隨其伯父學造粉麵，一年後自己出來獨立在橫頭崗開舖，一辦就二十年，四年半前搬入城砦。現任店主自小跟他學藝，現在店舖基本上已交給現任店主打理。

在店主的居所方面，除了個案十九外，其餘三個個案的店主都是住在砦外，城砦只是他們做生意的地方。他們設廠於城砦之內原因都是因為城砦內租金便宜，且不受勞工防火等條例的管制。

店舖在城砦開辦的時間方面，除了個案十九的一店外，其他三店的都頗短。個案十九一店在砦內有二十年，而個案廿一一店則只有八年，個案廿一店經營了四年半而個案廿二一店則只經營

了三年。

(5) 五金業

據街坊福利會的調查，城砦內五金店有五十六家，我們訪問了其中兩家，分別是位於龍城路和光明街（個案廿三和廿四。）

個案廿三一店在城砦內開辦了十多年，店主在打鼓嶺道另有一作坊，城砦這一所只是分廠。城砦分廠的工作主要由一位李小姐負責，另外聘用了一位兼職。李小姐和兼職兩人都是透過街招而尋得此份工作。個案廿四的一所五金店在城砦已有三十九年，店內共有三位工作人員，而該店亦是他們三人合資開辦。他們是同鄉鄰舍，來港後便合資開辦五金店。五金店內所有工作都由他們三人負責，沒有再聘用其他員工。

在住址方面，個案廿三店主住在城砦外，上址只是工廠，至於員工方面，其中一位住在砦外，另一位居於砦內。個案廿四的三位店主，除了單身的一位外，其他兩人均居於砦外。

(6) 醫藥行業

四個個案中，個案廿五及廿六是藥行，個案廿七是中醫醫館，而個案廿八則是我們是次調查訪問所得唯一的西醫診所。

在僱用員工的情況方面，除個案廿六外，其餘的藥行，醫館均沒有聘用員工。個案廿五的藥行店主在二十年前曾透過朋友輾轉介紹而僱用了三名行內人。現在該藥行只剩下店主與其妻子二人打理。個案廿六中，三個員工均是店主的朋友介紹來的。當初店主由他父親的朋友介紹入行，

隨其師父學習若干年後，他的師父退休，他就「頂」（接手）了該藥行，繼續營業。個案廿七的中醫是已退休的學校校長，平日為病人把脈，開藥方，病人拿藥方到藥行「執藥」（買藥材）；該中醫師替人把脈只當是興趣，所以沒有聘用人手幫忙。個案廿八的醫務所是由兩夫婦一起經營，這對夫婦均是內地醫學院的畢業生，十年前來港。由於他們是內地畢業生，所以不能在香港合法執業，於是他們便在城砦開辦診所。診所內所有的工作均由兩人分擔，丈夫主外科而妻子則主婦科及兒科。因為他們現時與另一醫生共同分租一單位作診所，所以地方較狹小。

在入行的情況方面，個案廿五的店主原本從事瓷器行業，遷入城砦居住後才決定開辦藥材舖。然而，他卻從未學過中醫。個案廿六的店主是中醫師，當初他是經由父親朋友的介紹而跟一位中醫習醫，並且在其師父的藥行中工作。當他的老師退休時，老師的兒子都不願繼續藥行事業，於是現有店主就出錢接辦其老師的店舖，承其業號，繼續營業。該店主除了跟隨其師習醫外，亦會修讀過本地中醫學院所舉辦的中醫課程。個案廿七的中醫師，執任中學校長時，已對中醫醫學產生興趣，透過朋友介紹跟人習醫，滿師後他就利用空餘時間替親友診治，如是病人口碑相傳，介紹了很多人來求診。雖然也掛出中醫的招牌，但從他習醫至今，都非以行醫作為正職。如今老醫師雖年事已高，但仍繼續為人看病。個案廿八中兩位醫生都是經過考試的途徑進入醫學院。受訪兩夫婦在高中畢業後，經過公開考試而考入廣州中山醫科大學，畢業後在內地醫院行醫，後來因為丈夫要繼承姑母財產而來港定居。

在開辦時籌集資金方面，除了個案廿五的藥行外，其他三家都是自資經營的。個案廿五的店

主在開業時資本不足，於是向朋友和親戚借錢，所借的錢不用還利息，該筆貸款在七、八年後店主已全數還清。其餘的個案廿六，廿七，廿八均是店舖店主自己自資開辦的。

在店舖開辦的年代方面，個案廿五的藥行在砦內開辦了三十二年，個案廿六的只有年半，個案廿七的有二十多年；個案廿八的有十年。其中個案廿六的藥行原是在城砦附近的東頭村營業的，後來因為東頭村遷拆，才搬到城砦內。個案廿八中的兩夫婦則是一九七八年來港，故此經營年代較短。

在居所方面，個案廿六的藥行店主全家都是住在店舖內，前舖後居。個案廿七的藥行店主也是住在砦內，他的診所就是他的家。至於個案廿六及廿八的店主則只把砦內的店舖當作做主意的地方，他們的居所均是在砦外。

(7) 糕餅業

在街坊會的統計中，從事糕餅製作的計有三十三家，我們只訪問了其中兩家，這兩家分別位於東頭村道（個案廿九）及大井街（個案卅），後者專製潮州糕餅，前者則製作一般廣東糕餅及食品。

個案廿九的店舖內除東主一人外，另僱有三位糕餅師父，在忙碌時亦聘用兼職散工，據稱最多時有十多人。散工大都是附近的街坊。店主需要人手時就托人找幫手，不必登報或貼街招，全靠街坊輾轉口傳。那三位師父則是這店舖創辦時就已在這裡工作。個案卅的潮州糕餅店是由店主夫婦二人負責，平時不僱用員工，但在工作較忙時，會僱用兩名長散工。這兩名散工都是與店主

有親戚關係的熟練糕餅師父。

在開辦時資金的籌集方面，個案廿九的店主是繼承其父的店舖而繼續經營的，老店主在七、八年前將店舖交給店主。因為店主不肯透露，所以當初老店主怎樣開始經營則不清楚。個案卅的店舖在開始時是店主與同鄉兄弟合資的，後來他同鄉退股，店舖就全由店主及其妻子支持。當初店主是跟他叔父學製餅，四年後他叔父退休又無兒子肯繼承店舖事業，店主就決定和另一個同鄉兄弟合資，承辦了叔父的店舖及名號。

在砦內經營時間方面，個案廿九的一店從店主父親開始到現任店主為止，已經營超過三十年。而老店主當初便在城砦開辦店舖，退休後交給兒子繼續在原址經營。個案卅的一店在砦內的歷史只有四、五年而已。店主從事此行已有二十多年，但當初是在砦外經營，後來因為原有店舖遷拆，才把店舖搬到砦內。

在居住方面，個案廿九的店主全家都是居於店舖內，但店主父親及兄弟均已遷出城砦，只剩下店主夫婦及兒女居於砦外，平時早上七、八點回砦內開舖，到晚上收工後才回家。

(8) 塑膠業

塑膠業在砦內是工廠和作坊為數最多的行業之一，據街坊會統計有九三家，數目僅次於牙醫醫館。是次調查我們訪問了其中兩家，個案卅一的一所位於老人街，個案卅二一位於龍津道。

個案卅一塑膠廠主要是廠主一人在工作，另外有數目不定的件工（一至四人左右）。這些件工是廠主以前的鄰舍。該廠原址在鑽石山，已有三十多年歷史，這批件工就是當時的鄰舍，工廠

拆卸後便遷到城砦內，他們亦到城砦工廠取外發。個案卅二的塑膠廠是一所塑膠加工廠，除了廠主外另僱有兩名員工。該兩名員工是廠主朋友介紹來的。

在開辦情況，個案卅的工廠原屬廠主的外父，後來轉讓給廠主。當初廠主經過他姨母介紹到老廠主處學師，兩年滿師後就留下來工作，後來與老廠主女兒結婚，外父退休後，廠主就接下該工廠。個案卅二的廠主曾任職於工務局二十多年，後來爲了自己想做老板，就利用平生所積的儲蓄轉入這行，完全沒有朋友或親戚幫忙。

在居址方面，個案卅一的情況如上所述，工廠原是在砦外，五年前因爲舊址遷拆才將工廠遷入城砦內，廠主仍在砦外居住。個案卅二的廠主原先已居於城砦之內，爲了種種方便將工廠設於砦內，工廠設於砦內至今已二十多年。

(9) 肉食業

是次受訪的肉食業有兩類：燒臘和製魚旦，受訪的燒臘舖有一家（個案卅三），和製魚旦工廠兩家（個案卅四，卅五）。燒臘舖並沒有僱用員工，只有店主兩兄弟在工作，他們在店內設置燒臘工具，兩人都是燒臘學徒出身的，所有的工序都是兩兄弟完成。個案卅四的製魚旦工廠有兩個東主，他們僱有三個員工，其中一位員工與受訪的東主有同鄉關係，另外兩位則是透過同籍貴的朋友介紹來的。個案卅五的魚旦工廠沒有僱用員工，只有廠主夫婦二人在工作。據廠主說，未遷到現址時，工廠設在西城路，經營了十多年，曾僱用五、六人工作，這些員工都是透過同籍貴的朋友介紹，聘請時不用貼街招也不用登報。當廠主的孩子還年幼時，他們間中會出來工廠幫

忙，但現在長大後，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就不再到工廠幫忙。

個案卅三的燒臘舖由兩兄弟合資經營，兄弟各出一半資金，開辦時沒有其他人幫忙，全靠兩人自己的儲蓄。兩兄弟中，哥哥在內地時已從事燒臘工作，偷渡來港後便在燒臘店工作。弟弟在內地也是從事燒臘行業，經由姑丈申請來港；來港初期在姑丈的製衣廠工作了兩、三個月，隨後轉到其舅父的燒臘店工作了四年。最後，兩兄弟爲了自立，便把儲蓄拿出來合伙經營。個案卅四的工廠是由現時兩位廠主合伙經營，這間工廠原是他們兩人的舊老板所有，舊老板想結束營業時，他們兩人就合資出錢承接了廠房，繼續營業至今。這兩位廠主最初只是同事，由同籍貴的朋友介紹到該工廠工作。個案卅五的廠主由內地來港，來港後經過他姑媽的介紹在東頭村「大牌檔」（熟食檔）工作。他在那裡工作了四年多，並學會製魚旦。後來他才籌錢在城砦開了一個工廠，獨自經營。

在開辦時間方面，個案卅三的燒臘舖只開辦了三年，舖位是租回來的，燒臘舖兩兄弟同住於城砦內。個案卅四的工廠在上址開辦的時間不詳，但由現任兩位東主承辦以來則有五年多的歷史。兩位東主，其中一位居於砦內，另一位居於砦外；三名員工中則只有一位居於砦內。個案卅五的魚旦工廠在砦內已有三十多年歷史，在西城路經營了十多年，遷到老人街現址也有十多年；但廠主居於砦外。

(10) 其他

這一類包括有不同的行業，由於每一種行業只訪問了一家，故此將它們全放在此項中，以下

分別敘述每個個案的情況。

個案卅六是一家茶葉莊，位於龍津道，店舖由店主一人負責，他妻子很少出來幫忙，並沒有僱用員工。店主在內地已從事茶葉買賣，來港後在同鄉親友開的茶葉莊工作，後來他才決定用積蓄開舖茶葉莊。該店在砵內開辦了二十五年，店主現在與家人住城砵外。個案卅七是一家米舖。位於龍津道，該店原在西頭村，兩年前西頭村遷拆，店主才把店遷到現址。該店原由店主的父親開辦，七年前其父退休，把店舖交給現任店主。

個案卅八是位於大井街的一間髮型屋。由兩夫婦經營，在上址開業只三年。丈夫由內地來港時，經由昔日同一工作單位的同事介紹到髮型屋學師，滿師後在髮型屋工作，直到三年前才在城砵開辦店舖。店舖開業時資本都是夫婦兩人的積蓄。因為夫婦兩人在城砵內居住，於是就選擇城砵作為開業的地方。

個案卅九是一間皮鞋作坊，位於光明街，在砵內開業已十多年。除老板外，另有一個員工。員工是老板早已相識的行內人，需要人手時就請他過來幫忙。作坊是老板自己的積蓄和向親戚借錢來開辦的，作坊是租用的，老板和員工均居於砵外。

個案四十是一間工程公司，專營鉛質工程，開業只一個多月。該公司共有五位合伙人，全是朋友，同學關係。該公司只是原公司的附屬，由一位股東負責，另聘有三名登報請來的員工。受訪的公司負責人原在另一間公司工作，他也是看到報紙的廣告後找到該份工作，工作了一兩年。有了經驗後，就找朋友自組公司。他不是住在城砵，只是為了工作方便才找到上址開業。

二、服務及製造業的特色

從上面的概述，我們發現城砵內的服務業和製造業，仍明顯地保留著傳統的運作模式。這些主要表現在下列各現象之中：

(1) 創業時的資本來源

從是次訪問調查所得，可以看到城砵內，店舖、工廠及作坊創辦時的資本來源主要有三種形式：自資、合資和借貸。

自資基本上是指店主以自己儲蓄所得的金錢作為創業的資本。當店主一人無法獨自籌集得足夠資本，其妻子亦會幫忙，她的金錢大都是來自平日的積蓄。但店主妻子這些錢並非「夾股」的股本，而是與丈夫的資金混合，不分彼此。與其他形式比較，自資可以說是最常見的創業形式。在四十家受訪的個案中，自資佔了十八家，約佔總數百分之五十。

合資是指兩人或以上匯集資本以創辦店舖。是次訪問中，以合資形式開始經營的店舖和工廠有七家。合伙人之間的關係可分為同鄉、朋友、兄弟關係三類；其中以同鄉的關係最多，在七個個案中佔了四例（個案十九，廿四，卅，卅四）；朋友次之，佔了兩例（個案廿一，四十），兄弟只佔一例（個案卅三）。從七個例子來看，採用合資形式的店舖、作坊，多是一些需較多人手的行業，例如製麵作坊、糕餅作坊、製魚旦工廠等。

借貸是指店主向別人借貸以創辦事業的情形。在是次的調查中，這種情形只佔了四例，它們分別是個案一，六和七的牙醫，和個案廿五的藥行，供資的對象主要是店主的朋友、親戚兩種，

所借款項或計息或不計息，據受訪者透露，貸款的利息不高。

在四十個個案中，開辦形式不詳的有六家，另有四家是兒子繼承父業，一家女婿繼承岳父事業的例子。

(2) 牙醫、醫生、廠主、店主的居處

受訪的四十個個案中共有四十三個店主、廠主、牙醫和醫生，其中居於城砦內的有十九位，而居於砦外的則有二十四位。由此可見，超過半數的醫館、作坊、工廠及店鋪的主人並非居於砦內，他們只是以城砦作為營業的地方。他們選擇城砦的理由，可以從受訪者的談話中找到，例如很多廠主、店主和牙醫都說他們所以選擇城砦營業，是因為砦內租平，樓價較低，此外亦不受法律限制（商業條例、防火條例、衛生條例及勞工條例等），這對他們來說是莫大的方便。而他們的顧客均是砦外人，並不限於城砦內的居民。

(3) 僱用員工方式

城砦的工廠、作坊及店鋪一般都是小型的企業，僱用員工的數目不多，若然需要僱用員工，其聘請的方式亦傾向於採用非形式化（Informal）的途徑。在十三個有僱用員工的個案中，採用較形式化（formal）的方法，包括有登報紙、貼街招，只有三家（個案十七，廿三，四十）。其餘大部份都是透過人事介紹，包括：街坊介紹、行內人介紹及朋友介紹等。街坊介紹的有個案十九，廿九和卅一，行內人介紹的個案五，廿一，卅及卅九，朋友介紹的有廿六，卅二和卅四。

(4) 子承父業

是次調查受訪的店舖有四家是子承父業，而有一家則是女婿繼承岳父的工廠。

個案十是一家牙科診所，診所由現任牙醫的父親創辦的。老牙醫在一九五一年從內地來港，他在內地已跟其父親（牙醫祖父）學牙醫，來香港後就入住城砦，在那裡開業，隨後申請妻子來港。現任牙醫在香港出世，中學畢業後跟隨老牙醫學習製假牙的技術，並在店裡幫忙。雖然五年，老牙醫退休時，已把診所交給現任牙醫，但他現時仍到店舖幫忙。

個案廿的製麵作坊也是父傳子的。現任作坊主人的父親四十多年前從內地來港，來港初期在紗廠裡工作，二十多年後決定轉行，跟其兄長學製麵，學了一年多，滿師後在橫頭磡開辦舖頭，在那裡經營了十多年。現任的作坊主人是其三子，十多歲時就在店內幫忙，四年半前橫頭磡遷拆時，他們遷入城砦，老店人便將作坊交給他。今日老店主仍然出來作坊幫助兒子，照常作一般的工作，只是作坊歸兒子所有。老店人之所以將作坊交給這個兒子，是因為只有這個兒子肯從事這一行，其他兒子都不肯願意，所以順理成章的將作坊交給他。

個案廿九是糕餅製造作坊，在城砦已營業超過三十多年。由現任作坊主人的父親創辦，從起初的一個五百多平方米的單位發展到兩個單位合併做為一個作坊。作坊聘用三個製餅師父，另外有其他散工，兼職，但人數視乎生意的情況而定。六、七年前作坊主人的父親退休，將作坊交給她負責，現在老主人已甚少到工場幫忙。

個案卅七是一家米舖，搬到現址只有兩、三年左右，以前的營業地址在西頭村。由於他們大部份的顧客都是住在九龍城、東頭村附近，所以西頭村清拆時，他們選擇了城砦作為繼續營業的

地方。現任店主是繼承其父原來的店舖。他父親四十多年前從內地來港，曾在紗廠工作，後來經過親友介紹到一間米舖工作；十年後，自己開店。現任店主是他的大兒子，中三結業之後就出來店舖幫忙。直到七年前店主父親退休時，才將店舖交給兒子，但老店主仍繼續留在店裡負責一些，例如賣東西給上門的顧客，作電話訂貨的記錄等較輕鬆的工作，其他粗重的工作如送貨則全由兒子來做。

個案卅一的樹膠工廠是較少見的例子，該工廠的創辦人是現任廠主的岳父，廠主十四歲來港，經他姨母介紹，隨現在的岳父學師，滿師留在原廠工作。他的岳父原打算把該工廠交給他的大舅，但大舅不肯做便轉交給他。工廠原在鑽石山，五年前遷拆後他才搬到城砦。

丙、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為

現在，九龍城砦的範圍內共有三間廟宇，包括位於東正道的福德古廟、在大井五巷的福德廟及位於天后廟街的天后廟。而在城砦附近，則有位於聯合道與東頭村道交界的侯王廟；位於較遠的則有黃大仙的黃大仙廟及位於觀塘道近坪石村的三山國王廟。除了廟宇外，在城砦內的社公街設有一個社公的神位，而在大井街則有一個已棄置的古井，井旁設有一個井神的神位。

城砦內有一些私人團體或一小撮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些私人的地方，甚而是住宅內，設置神壇或神位供有關的少數人士進行宗教活動。例如，在龍津道五號義學大樓地下的大堂，設有一個義德善社；在東頭村道三十一號的一個住宅內設有一個「天后古媽」的神壇等。此外，還有一些

專為恭賀某一個神誕而成立的誕會，例如「伯公」會及天后誕會等。

外來的宗教團體包括有在城砦開設老人中心的中華傳道會、東頭村道三十一號的香港基督教福音中心、在西坡路的港澳信義會信安堂、在老人街桂盛樓的天主教傳會、和在龍津三巷設有戒毒中心的「水源」（天主教）、開設托兒所的救世軍等。這些外來的宗教團體都在城砦內提供不同的社會服務，但由於本文將集中探討城砦居民地道的傳統民間信仰與族羣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這些外來的宗教將不予詳細探討。

本章將探討城砦居民傳統民間信仰與族羣之間的相互關係，分析方面主要是從社區性的廟宇及神位、宗教集社、店舖與工廠內的宗教設施，及家庭神祇四個層次出發。

一、社區性的宗教場所

東正道的福德古廟只是一間臨時性的建築物，位在城砦外圍。廟內的神壇上供奉著主神福德老爺的神像。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神像及神主牌，例如關帝、觀音、天后、黃大仙、齊天大聖及八仙等。但除了福德老爺的神像之外，其他的神像都是個別善信放在廟內供奉的。通常都是在搬家的時候，人們喜歡把家中原有的神像或神主牌留在附近的廟內，繼續接受香火的供奉。

據居民所述，福德老爺就是本地人（廣府人）所謂的土地，而潮州籍人士則多稱為「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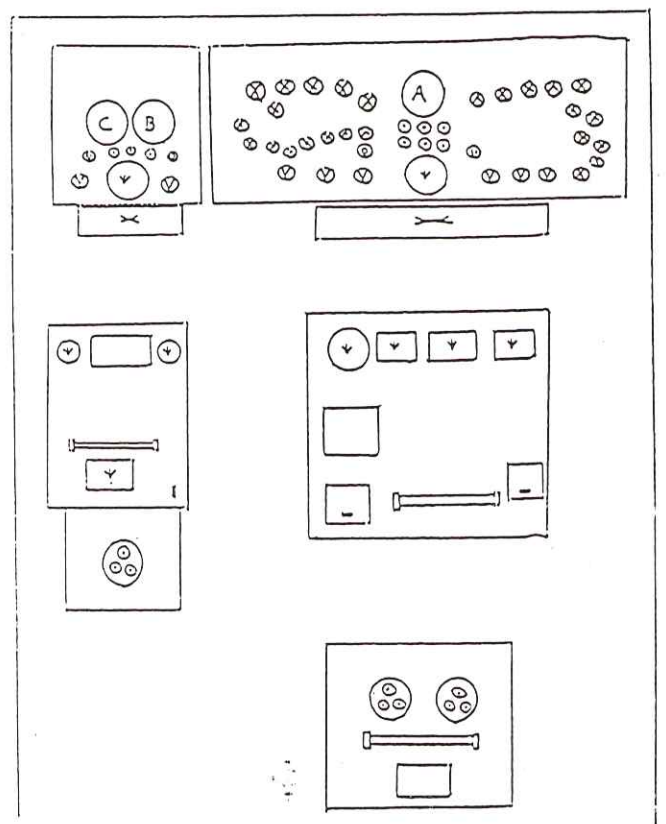
廟內有三張供桌，其中兩張是並排地放在前面，另外的一張則放在後面。前面兩張供桌上一共安放了三個香油箱（圖1）。三個香油箱都上了鎖，分屬三人所有。三人都是潮籍人士，其中

一人是一個六十來歲的男性。據他說，從前有個林姓的人負責打理這間廟宇，這位林先生過世後就改由他來負責打理。另一個香油箱從前是屬於一個中年婦人所管理，一年前她病倒了，便把香油箱交由一個五十來歲的張先生來管理。這位張先生在他的香油箱旁安放了一個告示牌，上面寫著「誠心定有好果，老伯公香油金，奉獻東華三院，為善最快樂的事。」等字句。據他說，香油箱內的錢都會在東華三院籌款時全部捐出作慈善用途。還有一個香油箱是屬於一個名為福德慈善社的宗教團體所管理，他們除了安置香油箱外，還在廟旁放置了一個大的貯物箱。

據報導，從前在城砦內及城砦附近，一共有四間福德廟。城砦內的是位於大井五巷的福德廟，而在現今東頭村二十一座那個地方從前有一間土地公廟仔，俗稱「老廟」。二十多年前，由於政府清拆該處的舊有建築物，便在東正道搭建了現今那間福德古廟，將土地公廟仔的神位及香爐等都搬過來一起供奉。另外，在美東村附近的公路，近現今遊樂場的位置，從前經常有交通意外發生。於是人們就在那裡興建了一間「廟仔」供奉福德，從此交通意外就減少了。後來因為土地利用的重建計劃影響，那間「廟仔」的神位亦被搬到東正道那間福德古廟內。

此外，在鄰近城砦的福佬村道，從前亦有一間福德廟，供奉的人主要是潮州籍人士。但在三、四年前，該廟的神位亦被搬到現今東正道那間福德古廟之內。所以，位於東正道那間福德古廟內的神位，實際上是來自附近三間福德廟的。但這些福德廟一直都是由潮州籍人士所打理，所以居民亦稱之為「伯公」廟。

福德廟的供桌上，除了用作供奉福德的香爐外，還有兩個刻有「天地父母」的香爐及一個刻



- ↓ 香爐
- 香油箱入口
- ◎ 茶杯/酒杯
- 花瓶
- 燭台
- 燭台
- 墊褥 (跪拜時用)
- 其他神像 (例如觀音、關帝等)

- A 福德像
- B 福德像
- C 土地婆像
- D 聚寶爐 (香燭冥錢焚化爐)

圖1 東正道福德古廟平面圖

有「諸位福神」的香爐。一般而言，只有潮州籍人士才會供奉「天地父母」，其他族羣則甚少。這間福德廟的賀誕日期是農曆三月二十九日，但在三月二十七日開始就已經有很多善信來賀誕。賀誕的供品主要有水果、雞、鴨及豬肉等。

位於大井五巷的福德廟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廟宇，據說已有九十多年歷史。現時由一位七十多歲的廟祝負責打理。廟祝是潮州人，歷來三代都是在這間福德廟當廟祝。據說，這間福德廟從前是一間獨立的石屋，廟前及鄰近都沒有興建房屋。但在七、八年前，建築商把這間福德廟重修，在廟宇之上興建多層的住宅樓宇，而廟宇的前方及鄰近的地方都已經是高樓林立。通往福德廟的街巷變得迂迴曲折、陰暗濕滑，所以前往拜祭的人也就變得很稀少。據廟祝說，現在每個月的香油錢只有一百多塊錢，前往拜祭的除了城砦的街坊外，亦有部份是城砦附近的居民，其中包括潮州人及本地人，亦有客家人及上海人。

廟宇內各神位分別安放在三個並排の間隔中，正中的神位供奉著福德老爺及地母，左方的神位供奉著天后娘娘，而右方有珍珠娘娘及珠珍娘娘。各個神位均安放著木彫的神像，而各個神位的香爐則放在神位前的一張供桌上。供桌上還放有水果，還有另一張供桌，上面有一個香爐，爐邊寫有「天地父母」四字。香爐的前方有水果，湯丸、糖果等供品，還有油燈及香油箱（圖2）

廟宇內有香蠟、元寶、貴人錢及家宅錢等拜祭用品售賣，但拜祭的人亦可自備有關的物品。此外，廟內備有蒲團及鐵筒，供拜祭者求籤之用，廟祝可代為解籤。據報導，前往這間廟宇拜祭的人多數是為求家宅及個人平安而來的，而最多人前往拜祭的日期是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及六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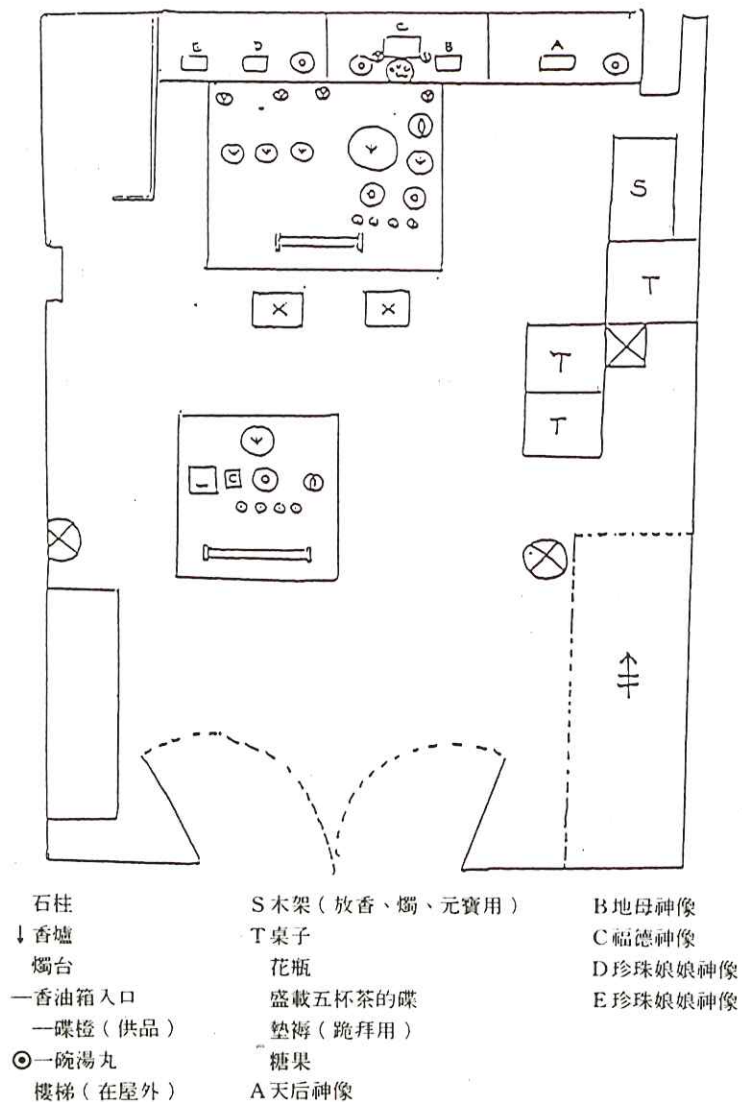


圖2 大井街五巷五號福德廟平面圖

十六日的土地誕，及每月的初一、十五做碼、十二月二十二日還神及七月燒衣等時節。拜祭用的供品包括燒肉、豬肉、雞、鴨及水果等。水果主要是在每月初一、十五碼時供奉。而特別前去祈求平安的時候，亦有自備金豬作供品的。

據廟祝報導，很久以前這間福德廟的正前方是一片空地。興建了樓宇後，曾經用作教堂、學校及店舖等，但最後都紛紛倒閉了。據說是由於廟宇的正前方不應該有樓宇阻塞，不然的話就有不良後果。

位於天后廟街的天后廟，廟內並無碑記、銅鐘、銅鼎等物件，因而其創建年代未能考究。現今所見的，是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所重修者。廟門兩旁有民國四十年三月所立之木聯，木聯上寫著「水德配天，香島慈航普濟；母儀稱后，龍城廟宇重光」。據報導，這間天后廟約有六十多年歷史。廟內供奉著天后娘娘的正身神像及行宮神像。廟宇是由一位潮州籍的中年婦人負責打理。這間廟內左方近中門入口處，在地上放置著一隻約兩呎長的紙虎，供拜祭者拜白虎及「打小人」（喬、梁一九八四）之用。

從前，天后廟的正前方亦是一片空地，後來廟宇的四周都興建了樓宇，通往天后廟的街巷變得陰暗、骯髒及濕滑，所以前往參拜的人也就減少了許多。但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前往參拜的人很多。而且亦有街坊組織了一個天后誕會，一起在天后誕的時候前往天后廟賀誕。

在社公街大井街的一小塊空地上，有一個社公神位。神位設有一塊石碑，碑上寫有「城砦古蹟」四字。石碑前面有一個福德土地的木彫神像及一個石香爐，香爐上刻有「福德老爺」四個

字。較前的地方則橫放著一個空木箱，用作供桌。

據說，從前這個社公神位是一個墳墓。當時，善心的人士只在清明的時候前往拜祭。但日子久了，後來的人不知道這個神位的來歷，也前往拜祭。漸漸地，這個墳墓就變成一個社公的神位。但現在，只有很少人會到這個神位拜祭。

在大井街有一個已棄置的古井，井旁有一個井神的神位。神位設有一塊石碑，碑上刻有「敬如」二字。石碑前供奉著一個香爐。現在，這個古井已經用鐵絲網封閉了。而事實上，許多居民根本就不知道那裡有一個井神的神位。

二、宗教集社

除了上述那些社區性的宗教場所之外，城砦內還有一些私人團體或一小撮志同道合的人組成了一些宗教集社。他們通常都是在一些私人的地方，甚而是住宅單位內，設置神壇，供有關的人士進行宗教活動。他們的宗教活動大都只限成員參與，而成員的人數通常都很少。

這些宗教集社之中，有一類稱為誕會。誕會是某一間廟宇的部份參拜者自己所組織的宗教團體，他們的成員每年都要繳交一定數目的會費，而每年於該廟宇的神誕日子，誕會的負責人就會召集會員到廟宇賀誕及祈福，並會分派豬肉等供品予各個成員。

例如，城砦內就有一個稱為福德慈善社的誕會。這個誕會是以東正道的福德為賀誕對象，會員以潮州人為主。因為潮州人習稱福德為「伯公」，所以這類以福德為供奉對象的誕會又俗稱為「伯公」會，本地人則亦稱之為土地會。這個「伯公」會的會員每年都要繳交會費港幣一百五十

元，而在每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伯公」誕，「伯公」會的負責人就會召集會員到東正道的福德古廟一起奉神，並會分派豬肉、雞、鴨等供品給各個會員。此外，亦有一個天后誕會是以天后街的天后為奉拜對象，而其活動的性質與上述的「伯公」會類似。

在龍津路五號義學大樓的地下大堂設有一個供奉老爺爺的神壇，稱為義德善社。據說，這個地方從前是一間古屋，好像是一間祠堂之類的建築物，但大約在八年前這間古屋因為太殘破而被拆毀，在該處興建了大廈，稱為義學大樓，而這座大廈的地下部份則興建成為大堂，留作供奉老爺爺及儲存雜物之用。這個神壇是由一班鶴佬（福佬）人士打理。但是，大堂的正門經常上了鐵閘，通常只在時節及農曆每月初一、十五，那些鶴佬人才到那裡打開鐵閘入內參拜。

在東頭村道三十一號B後座三樓的住宅單位內，設有一個供奉天后的神壇，稱為「天后古媽」。神壇設在住宅單位的大廳，供奉著天后的木彫神像。神壇前設有一張供桌，上面放有一對木製的「筊杯」，是作為「問杯」之用。這個神壇是三、四年前由西頭村東正道搬來，屬私人所有，但並無正式的會社組織。當時是由街坊捐出款項及奉神的器用來建造這個神壇，而捐款人的姓名、物品的類別及數量則明列於紅紙上，在屋內左方的牆上張貼。在神壇上方掛著一對「聖球」。「聖球」表面有短刺，形狀像榴槿，每個有數斤重。據說，數年前有一位黃姓人士曾在神壇前請神上身，然後用「聖球」擊打自己的身體而沒有損傷。從此，這對「聖球」就被掛在神壇前。

這個單位每天都不定時地開放，由一個人來負責打理有關雜務。而附近的街坊都可以入內參拜天后，無須加入甚麼誕會之類的組織。參拜者多數是潮州籍人士。每逢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來這個神壇參拜的人士就特別多。

此外，城砦內的一些住宅單位亦有其他類似「天后古媽」這類非正式，甚而是非公開的神壇。但亦因為如此，這些神壇都鮮為別人所知悉，只是有關的一小撮人才會參與其宗教活動。

除了少數的城砦居民會參與上述的團體性的宗教活動之外，有不少的城砦居民亦會參與鄰近地區的集體性宗教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年農曆七月盂蘭節的盂蘭勝會。盂蘭勝會在庶民信仰中是為了解濟餓鬼而舉行，但其中亦有附薦的習俗，在香港，盂蘭勝會絕大多數是由潮州或海陸豐人士所主辦，而且多數是以某地區街坊的名義舉辦（梁一九八四：卅二）。每年農曆七月初及七月中，東頭村及九龍城的街坊，都分別租用附近的球場來舉辦盂蘭勝會，一連三天。據調查所得，城砦內的潮州籍人士有部份會在盂蘭節期間，在不同程度參與九龍城盂蘭勝會或東頭村盂蘭勝會的活動，其中包括捐款，到現場參拜，觀賞潮州大戲及競投盂蘭勝會的聖物等。投得聖物的人，會將那些聖物，例如燈籠、符及紙扇等，掛在門前或貼在牆上，作為保平安、驅邪及擋煞之用。

三、店舖與工廠內的宗教設施

城砦內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店舖及小型工廠。由於該處的租金特別便宜，所以吸引了不少店主、廠主前去開設店舖及廠房。

城砦內店舖及廠房，大部份都設有一些神位。最普遍的就是關帝及地主的神位。在庶民信仰

中，關帝象徵公平、正義，所以店主，廠主們都喜歡在他們的店舖及廠房內設置關帝的神位。而關帝也就成爲工商界的普遍行神。

關帝及地主的神位，通常都是設置在神樓內。除了因爲地方擠迫問題，神樓都是面向正門。關帝的神位設置在神樓最高的一格，地主的神位則在神樓最低的一格。關帝的神位內，除了香爐、燭台等之外，都會擺放一張關帝或劉備、關公、張飛的三聖像。亦有一些東主會放置一尊彩瓷的關帝像在神位內。而地主的神位則極爲統一，神位內都是設有香爐、燭台等，還有一塊神主牌，牌上寫有「五方五土龍神，前後地主財神」這兩行字句。

亦有部份店主會在神樓最上的一格設置觀音，甚至是祖先的神位。觀音的神位通常都設有一尊白瓷或彩瓷的觀音像。但極少店主、廠主會在店舖或廠房內設有祖先的神位，因爲祖先所涉及的是家族內的事，所以通常都只會在住宅內供奉。

此外，許多店主、廠主都在門外近大門入口的地方設有天官及門口土地的神位。天官的神位設在門外近大門入口的牆上，而門口土地的神位則設在大門口旁的地上，緊貼牆邊。這些神位的擺設都十分簡單，大部份都是只設有香爐及神主牌。有部份神主牌是木製的，有部份只是一張寫了字句的紅紙。天官的神主牌上面都是寫著「天官賜福」的字樣，而門口土地的神主牌上則寫著「門口土地財神」。另外，有少部份潮州籍的店主會在大門外設置「天地父母」的神位，但這些神位通常都是十分簡單的，只有一個香爐及一張紅紙造成的神主牌，紙上寫有「天地父母」的字樣。

有少部份的店主亦會在神樓最高的一格設置其他的神位，例如黃大仙，侯王及三山國王等，但這樣的個案很少。還有一種較常見的現象，就是在店舖或廠房大門的門楣上掛上八卦、擋煞鏡、紙扇、桔子等，或貼上紙符之類的物品，作爲驅邪及擋煞之用。亦有部份店主、廠主在附近的廟宇或孟蘭勝會買了燈籠回來掛在門前，象徵吉祥及帶有祈福的意義。

四、家庭神祇

城峇內不少的家庭在其屋內都設有神樓。神樓通常都是面對正門的，但亦有因爲屋內的地方狹窄而將神樓安放在其他的位置。在大部份的情況，神樓最下的一格都安放著地主的神位。地主的神位通常都只設有一個香爐及一個神主牌，神主牌上寫著「五方五土龍神、前後地主財神」等兩行字句。而神樓最上的一格則用作安放祖先神位及其他神祇的神位。據調查所得，並非每個神樓都設有祖先的神位，有部份神樓最上的一格只供奉著關帝、觀音、黃大仙等神祇。有趣的是，在我們的調查個案中，只有潮州籍的被訪者才會有上述的情況出現。

另外，有一些個案的情況是只設有香爐供奉祖先，但並無祖先的神主牌。例如，有一位祖籍揭陽的潮州人，屋內的神樓供奉著三個香爐，在地上的香爐是用作供奉地主的，而在較高位置那兩個則用作供奉觀音及祖先的。觀音的神位設有一個白瓷的觀音像，但祖先的神位則只有一個香爐，沒有神主牌。此外，亦有只在神樓安放祖先神位而並不供奉其他神祇的。這種情況則不論是否潮籍人士都有實際個案。

祖先神位的形式有多種，有些較簡單的就只安放一個香爐作爲供奉祖先之用，但較普遍的形

式是同時安放神主牌及香爐。在我們的調查個案中，神主牌上都只包括有該家族的姓氏，並無將最近幾代祖先的名字及世代等列於神主牌之上。而在某些個案中，祖先的神主牌是放在不同居處的父母或兒子的家內，因不再另設祖先神位在自己的家內。

除了屋內的神位，屋外近正門的地方亦經常會有一些神位。最普遍的情況是在近正門的外牆上離地面較高的地方安放「天地父母」或天官的神位。「天地父母」或天官的神位通常都很簡單，只有一個香爐及一個神主牌。「天地父母」的神主牌通常都是一張紅紙，上面寫著「天地父母」四個字，但亦有少部份是採用在木牌上刻字的形式。而天官的神位則兩種形式都同樣普遍，通常神主牌上都是寫上「天官賜福」四個字。

「天地父母」主要是潮州籍人士的拜祭對象。但據我們的調查所得，只有少部份的潮州籍人士在屋外交放「天地父母」的神位。此外，有較多的居民會在門外擺設天官的神位，特別是廣府人及其他非潮州籍人士。但部份的潮州籍人士亦會在屋外交放天官的神位。

要注意的是，我們發覺並無任何一個個案是在門外同時設有「天地父母」及天官的神位。而有部份被訪者，包括有潮州人及廣府人，認為「天地父母」就是天官。但另外的一些被訪者則持有不同的意見。事實上，居民似乎對於「天地父母」、天官、「當天」、天神及天公等觀念的理解，有著很大的分歧。例如，被訪者之中，有一位廣府人認為在「當天」所拜的是天神，而天神與「天地父母」是不同的；一位潮州人則認為「天地父母」即「當天」，主要是潮州籍人士才會拜祭；而一位南海人士認為「天地父母」即是天官，也就是「當天」；另外，有一位廣府人則認

為天公就即是上天，與「天地父母」不同。

在屋外，除了會安放「天地父母」或天官的神位外，在正門旁邊的地上亦經常會有門口土地的神位。門口土地的神位通常都相當簡單，只有一個香爐及一個神主牌。有部份神主牌是木製的，有部份只是一張紅紙，上面寫著「門口土地財神」的字句。無論是否潮州籍人士都有設置門口土地神位的習俗，但並不是每家每戶都會這樣做。

除了上述的神位外，許多的住宅門楣上都掛上八卦、擋煞鏡、桔子等，或貼上紙符、貴人、祿馬等、作為驅邪、擋煞及祈福之用。

五、分析與討論

九龍城峇現有的居民，主要是在四十年代及以後從中國大陸陸續湧入的移民。除了少部份是涉及政治及法律上的問題之外，他們主要還是基於生活消費低的理由而搬到城峇居住。所以，九龍城峇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區。

移民社區的居民，由於是相繼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籍貫的移民，所以在語言及次文化上都富於多樣性，而且會在某些生活層面上，保留著地方傳統的色彩。但另一方面，為著要適應實際生活環境，他們在具體的生活層面上會產生了較大的轉變，特別是在經濟生計方面。

而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為，因為是屬於意識型態的範疇，植根於較深的層次，所以相對地持久而不易產生變化。換句話說，就是移民社區內的宗教信仰及儀式行為應該更能保留著地方傳統的特質。

同時，由於城砦內的居民大部份都是在外工作、早出晚歸的低下階層，在日常生活中就甚少有長期性的深入交往。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上多樣化的現象在家庭與個人的層次就更明顯地保留著。例如，一間位於東頭村道的中藥店內就供奉著一個稱為「活佛祖」的神祇。神位內除了有一個香爐之外，還有一張「活佛祖」的畫像。據藥店老闆報導，「活佛祖」原是福建紹安縣四都鎮上湖村人士，時約一百三十多年前。當時「活佛祖」曾顯靈，一百多天沒有進食仍安然無恙。後來，人們就開始供奉他，並為他建廟。藥店老闆的妻子就是從該處地方遷居香港的，因而將「活佛祖」的神位及傳說一併帶來。但這個極為地方性的信仰對象在城砦內就只有這一家人供奉。

而在集社及社區性的層次，宗教卻對同屬一個族羣，甚而是對同屬一個社區但不同族羣的人們起著一種整合作用。此外，由於城砦內並沒有宗親會及同鄉會等宗族及地緣組織，所以集社及社區性的宗教活動對族羣及社區的整合作用就更為重要。例如，城砦內的「伯公會」、「天后古媽」，與城砦附近的九龍城孟蘭勝會及東頭村孟蘭勝會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起著族羣的或社區性的整合作用。當然，由於城砦人口稠密，而且居民的異質性非常高，所以這種整合作用仍是有一定的限度。

我們發現，九龍城砦居民的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為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歷史較為悠久的一些廟宇及神位，到現在都很少人前往參拜。取而代之，一些較後期才建立的廟宇及神壇，前往參拜的人則非常踴躍。天后廟街的天后廟約有六十多年以上的歷史，而在大井五巷的福德廟約有一百年的歷史，但現在這兩間廟宇的香火甚少。相反地，東正道福德古廟內的神位大約在二十年前

才開始從別處搬來，但這間臨時性的廟宇卻香火鼎盛。此外，社公街的社公神位及大井街的井神神位都具有相當的歷史，但現在卻甚少人會前往拜祭，而像「天后古媽」這類新興的社壇卻極受居民所歡迎。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較早期建立的廟宇及神位都是建在城砦中心的位置。後來城砦人口膨脹，高樓林立，位於內圍的廟宇及神位就變得並不顯眼，加上城砦內的街道錯綜複雜，而且非常骯髒、濕滑，所以對前往拜祭的人們來說就極之不便。而較後期才建立的廟宇及神壇，例如東正道的福德古廟及東頭村道的「天后古媽」，都是位於現今城砦外圍的地方，對拜祭者來說極為方便。

另一方面，由於城砦是一個移民社區，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新移民，而且居民的流動性高，所以有關早期廟宇及神位的傳說等都較難得以承傳及流傳，因而這些廟宇及神位並非廣為人所周悉。

城砦居民的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為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一些用作辟邪或擋煞等物品相當盛行。在許多的住宅、店舖及廠房的大門門楣上，都掛有八卦、擋煞鏡、紙扇等，或貼有紙符、貴人、祿馬等。相信這是城砦作為一個移民社區的特點。大部份的居民都是新移民，而且多數是在城砦外工作，早出晚歸，居民之間的認識不深，互相之間有疏離感。面對種種新環境所帶來的問題，居民的心理上較為容易產生一種自保的心態，而宗教性行為是用作消滅不安、憂慮、恐懼等心理問題的一種有效方法。所以，用作辟邪、擋煞，以至祈福的物品，在城砦內都特別盛行。

綜觀上述的描述與討論，我們發現由於九龍城砦作爲一個移民社區及其他本身的歷史性因素，城砦居民的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爲有其普遍性的特質及其獨有的特色。從人類學研究的角度來說，九龍城砦有關宗教信仰與儀式行爲的問題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題材。

丁、族羣與族羣關係

在進行是次調查之前，我們有一個基本假設，認爲族羣性可以清楚地表現在居民的職業、信仰或儀式行爲中。但在調查進行時，我們遇到了相當的困難，城砦人口衆多，要作一個全面的調查，短時間內極難做到，故此我們集中調查城砦店舖、工廠，我們假設這些服務或製造業在某種程度上亦能反映出個別族羣的特性。

一、族羣的關係

在調查之前，我們假設城砦是一個多元族羣聚居的地方，而族羣之間的關係可能會是：第一，不同族羣互相雜居；第二，出現一個主導的族羣或是與鄰近的族羣間形成了一股主導的勢力，例如潮籍人士與鄰近的閩南、鶴佬、海陸豐等。我們相信現時城砦的情況會以第二個可能性爲主，這就像海外華人的開拓情況，某一個國家往往會有一個主導的族羣。至於形成一個主導的族羣的原因，我們相信與其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有關，而社會網絡的形成又以方言，同鄉爲兩個主要的因素。

經過多次的訪問，我們發現上述的假設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從訪問所得資料中，我們相信城砦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族羣出現成爲主導勢力。換言之，城砦族羣之間曾經歷過互相取代主導地位的發展階段。我們假設城砦的族羣發展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客家人與蜑民爲主的時期，這個大概是四十年代或更早以前。由於年代久遠，蜑民是否曾在城砦內爲重要成員暫無法証實，但客家人爲主導的現象則可從訪問中得到証實。有一位在城砦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婦人說，在四十年代，城砦有很多客家人，他們大都聚居在一起，以前「城砦義學」附近一段的龍津路就是客家人聚居的街道。另一位受訪者，亦在城砦居住了四十多年，她以前在城砦有田地種菜，大概四十年代末期，她的木屋都是租給客家人居住的，甚少其他籍貫人士租住。

第二個階段可以說是多元族羣的時期，也可以說是潮籍人士進入城砦的時期，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以客家人爲主導的勢力漸漸消失，爲不同族羣的人共居的時代所代替，這個現象主要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的投降，在戰爭期間內地避難的居民回港定居。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易手後，又有很多人從內地來到香港，故此導致多族羣共居的現象。從時間上來說，這個時期大概是五十年代，在這個年代，城砦的屋宇一般都是木屋，也有部份是石屋，一般只有二、三層高。

第三個階段是潮籍人士爲主導的階段，大約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在這段時期城砦的樓宇由兩、三層高的混凝土樓或木屋轉爲五、六層高的混凝土樓，到六十年代後期更向高空發展，出現了十一、二層高的樓宇，到七十年代則更有高至十六層的樓宇出現。這個時期，潮籍人士透

過建築樓宇的機會變為城峇的主導族羣。當時很多潮籍的建築商，和有土地的城峇居民協議，擬定居民拿土地給他們起高樓，樓宇築好後就據協議給地主一至兩層樓作為交換。潮籍的建築商就這樣在城峇逐漸擁有了大量物業，由於潮籍人士的社會網絡較其他族羣來得緊密，故此很多潮籍人士就這樣進入城峇居住。上述那位有田地的受訪人亦是在七十年代初將自己所建的石屋交給潮籍建築商改建，據她說當時那些建築商多是潮籍人士，很少是其他籍貫的人。

最後一個階段是潮籍人士開始遷出，新的移民開始進入的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城峇內一些潮籍人士生活水平提高後就遷出，另外又有一批大陸新移民遷入城峇居住，使到城峇內潮州人原有的主導形勢開始瓦解。然而，這個階段由於資料有限尚未能進一步證實，但相信這將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問題。個案三八的東主夫婦就曾說近幾年城峇多了很多大鵬人（即深圳人），這都是新移民遷入的現象。

二、主導族羣

我們估計城峇族羣的發展有四個階段，其中以潮籍人士為主導族羣的時期最為突出，我們甚至可以說潮籍人士為主導族羣的現象到現在還延續著，且可清楚地表現在服務及製造行業上。

在四十家受訪的店舖、作坊及工廠，其中有十七家是潮籍人士開辦，其分佈如下：

- (1) 牙醫 : 四家(個案一, 二, 六, 十)
- (2) 商店/士多 : 三家(個案十一, 十三)
- (3) 水電 : 一家(個案十八)

- (4) 製麵 : 一家(個案廿)
 - (5) 藥行/中醫 : 二家(個案廿五, 廿七)
 - (6) 糕餅 : 一家(個案卅)
 - (7) 塑膠廠 : 一家(個案卅二)
 - (8) 製魚旦 : 二家(個案卅四, 卅五)
 - (9) 茶葉店 : 一家(個案卅六)
 - (10) 米舖 : 一家(個案卅七)
-
- | | |
|--------------|--------------|
| (1) 潮州 : 十八人 | (10) 梅縣 : 一人 |
| (2) 新會 : 四人 | (11) 興寧 : 一人 |
| (3) 四會 : 三人 | (12) 清遠 : 一人 |
| (4) 中山 : 二人 | (13) 鶴山 : 一人 |
| (5) 番禺 : 二人 | (14) 台山 : 一人 |
| (6) 海豐 : 二人 | (15) 四邑 : 一人 |
| (7) 東莞 : 一人 | (16) 南海 : 一人 |
| (8) 寶安 : 一人 | (17) 廣州 : 一人 |

由此可見潮籍人士所開的店舖、工廠幾乎佔了半數，而在四十三位店主、廠主之中，潮籍人士也是幾乎佔半數，共有十八人，各店主、廠主的籍貫簡列如下：

三、主導族羣的內聚力

(9) 福建：一人 (18) 五華：一人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上節中看到潮籍人士是主導族羣，雖然從我們的調查中沒有發現某一行業是為他們所壟斷，但在某些現象中，確能反映出潮籍人士的族羣內聚力較之其他族羣強烈。這個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

第一，店舖繼承方面。四家子承父業的個案中潮籍人士佔了三家（個案十，廿，卅七）。雖然店舖繼承的現象並非潮籍人士所獨有，但將潮籍人士的繼承方式與其他族羣比較，就可以發現在潮籍人士方面，兒子雖然繼承了店舖，但父親仍然到店舖幫助兒子（個案十、廿、卅七）。就如個案十的牙醫，其父親已七十多歲，但仍然每日到店舖幫兒子。相反，另一家新會的製糕餅作坊，兒子繼承了父親的作坊後，父親便不再出舖，完全由兒子一人打理。和店舖繼承相關的現象，就是技藝的傳承。兒子跟從父親學習手藝技術也不是潮籍人士所獨有的現象，但他們卻有將從父習藝與店舖繼承兩者結合的趨勢。

第二，在創辦店舖時籌集資本的形式。除了自己擁有資本的不論，潮籍人士和其他族羣的分別在於前者傾向於借資而後者傾向於合資。在七家合資的店舖中，潮籍人士佔了二家（個案卅，卅四），但在借資的四家中，潮籍人士卻又佔了三家（個案一，六，廿五）。這個現象似乎有深入探討的價值，或者，潮籍族羣有較強的內聚力是因為他們傾向於個人開創事業，寧願借錢以自創事業，以避免合資所引起的利益衝突。由於這樣，一方面加強了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另一方面

面，也加強了互報（reciprocity）的連繫。

第三，僱用員工的方式。潮籍人士和其他族羣的分別較大。除了一家潮籍商店聘用散工（主要是左鄰右里）時有非潮籍人士外（個案十二），其他需要僱用員工的潮籍店舖，其所聘用的員工均是潮籍人士。相反的，一些其他族羣在聘用員工時就不太注意僱員或員工的族羣背景，例如個案廿三的金店，其員工就有潮籍和寶安縣人，另個案廿一的製麵作坊就有南海和潮籍員工，曾經提及的新會籍東主的糕餅店，其所聘用的師父和散工的籍貫，東主就不太清楚，只約略知道非全是相同籍貫的。相反，潮籍東主聘請的員工大多是潮州人，而且他們也知道員工是否潮籍人士，因為他們日常的談話都全用自己的方言，所以員工是否潮籍人士他們都非常清楚。

戊、一個城砦人的經歷

當我們第二趟進入九龍城砦作訪問時，我們認識到「事頭婆」（註三）。她是九龍城砦的居民，在城砦內開設了一間茶水店，為附近的街坊提供廉價的小食。這所沒有店號的茶水店除了提供各種食品外，更為城砦的居民，尤其是住在城砦內的家庭主婦提供一個閒談的地方。

我們認識事頭婆，是從光顧她的小食開始。我們每次到九龍城砦訪問時，都順道入她的茶水店小歇，從閒談中，得知一些事頭婆的歷史和她對九龍城砦的觀感。現年六十歲的事頭婆自從二十歲嫁入九龍城砦夫家之後，一直生活在城砦。城砦對她來說正是她的根的所在。在這四十年中她所經歷的和所感受的，相信都比其他一般的城砦居民所感受的強烈和深刻。而這亦是我們選取

事頭婆作深入採訪的主要原因。

在這裡，我們希望透過對事頭婆的經歷的描述，為本文的討論作一象徵性的結論。

一、生活歷史與現況

事頭婆，台山人，一九二八年出生於大陸。二十歲出嫁，隨丈夫搬返九龍城砵居住。其丈夫家庭在幾代前已由台山移徙至九龍城砵，以種菜維生。

事頭婆的丈夫比她大幾歲，曾經進入九龍城樂善堂（現已遷往衙前圍道）讀書。然尚未完成小學教育。

事頭婆與丈夫一九四七年在鄉下成親，該年年底搬返九龍城砵老家。翌年一月，城砵遭港府清拆。她記得當時警察把九龍城砵重重包圍。城砵居民都退守在義學之內，並向警察投擲石頭反抗，但最後不少的房子還是被拆去。由於當時居民所建的都是木屋，清拆人員只需用大鎚擊打和用腳踐踏就可以拆去房子，所以不到一日，大部份的木屋都被拆掉，其中亦包括事頭婆丈夫的老屋。最後她們一家只好蓋草蓆露宿。她還記得當時有一外籍女子曾經用照相機拍下她躲在草蓆的情形。講到這時，事頭婆還自諷說有趙向黃大仙求籤時，籤文都說她會做過乞兒。事頭婆覺得在香港最艱苦就是那個時候，而住的問題亦一直是從前城砵居民面對的最大困難。從前她的夫家在城砵還有十多擔水的菜地（註四），連城砵發現古炮的地方亦是她用來曬柴的地方，但在四八年那次清拆後，這些地方被人佔去。到最後她們只剩下現時茶水店這一小塊土地。

在三十多年前，事頭婆剛產下兒子不久，這老屋又要拆卸。於是她們在城砵內再買地蓋屋。

新建的房子是石屋，在當時九龍城砵內是最好的一所樓房。因為她是向親友借錢來建這房子，爲了還債，她和家人便把最好的一層租給別人，每月收回二十五元租金，當時城砵內面積五、六百尺的房子一般都是月租十至十四元。另外，她又把其中一層以日租五元租給毒販作煙格。幾個月後，由於怕警察「冚檔」，便不再租給他們。

一方面要還債，另一方面家庭入息又低，結果事頭婆便只好把親友送給兒子的滿月金飾典當，這些小金飾，小戒子都不大值錢，所以她差不多天天都要上當舖。當時曾經有人建議她們「借大數冚細數」，然而事頭婆並沒有聽從，那時她尚欠她哥哥幾千元，但她說無論如何都要先還給他。她說「流民流到九州，千期唔好流回家頭（娘家）」。她認為如果一個女人經常欠娘家錢便一定會被親友看不起。爲了在那個時候還債，她們一家人都挨著節衣縮食的艱苦生活。

爲了增加收入，事頭婆徵得家姑同意後便決定出外工作。開始時，她隨一些客家婦女到建築地盤做泥工，工資每日四元，但不久便因體力不繼而被解僱。後來她轉到馬頭圍一紗廠打紗。事頭婆記得當時每天天還未亮便出門，到天入黑才回來，家務和子女都留給家姑照顧。在那幾年，她每天都走著同一段路。除了九龍城砵和這段路之外，她從未踏進其他地區。後來由於要照顧子女，事頭婆才辭去紗廠工作，轉做一些如穿塑膠花等的家庭外發工作。間中，她又到熟食檔洗碗賺外快。在熟食檔兼職期間，她學會了烹煮各種小食的方法。因此後來她才會在城砵內搞一茶水店。

自來港後，事頭婆有空便會上黃大仙廟進香求福。她相信黃大仙一直都照顧著她一家，只要

誠心，黃大仙一定會保佑的。有時，事頭婆亦會去拜福德，但卻從未拜過天后。她說天后都是潮州人拜的，她通常都去拜黃大仙。近年來，除了黃大仙外，她還上沙田車公廟拜車公。農曆七月十五，潮州人要捐錢搞盂蘭會，但這些活動事頭婆都很少參加。

事頭婆今日的生活比昔日安定，她始終相信這是黃大仙的保佑。現在她有一茶水店，有自己的房子，亦有房子收租，生活比從前適意。她自己的房子有六百多尺，四房一廳，向陽光。女兒已經出嫁，現時與三個兒子和一個媳婦共住。子女都有固定的工作，最小的兒子更在政府職業訓練局進修。事頭婆基本的生計問題早已解決，所以那所茶水店只是早上才營業。上舖之後，事頭婆便去買菜和回家煮飯。有空暇的話，子女亦會和她一起出外旅行休息。

二、對城砦生活的觀感

住在城砦四十年，事頭婆目睹城砦的各種轉變。她經歷過四十年代末期城砦農村式的種菜生涯，亦親身感受過城砦人潮所帶來的各種衝擊和轉變。以下是她對城砦生活感受的點滴。

人口的激增和高樓大廈的湧現是城砦最明顯的轉變。事頭婆記得她搬進城砦不久，砦內人口便漸增加，後來人口增加的速度越來越快。原先在城砦居住的都是本地人和客家人，但在人潮湧入時，很多潮州人都搬入城砦，他們的人數可能比其他籍貫人士的總數要多。

樓宇改建的速度與人潮湧入城砦的速度亦致相近。但由於樓宇是逐漸加高的，所以事頭婆亦很難斷定甚麼時候開始出現現時所見的大廈。她說最初的時候，城砦內的民房都是一兩層高的木屋。她和家人所住的是一所有一閣樓的兩層木屋。後來見別人把房子加建至三層，她們亦照樣

做，並且改用石頭興建。但當改建完成時，城砦已經出現了五層高的房子。幾年之後，她的房子又拆掉改建為一所十三層高的大廈。她把房子拆掉加高，主要是受一些建築商慫恿。通常建築商提出的方法是城砦居民出地，建築商負責興建，如果建四層，原居民和建築商各得兩層，如果建兩層，則各得一層。利用這種互惠的方式，城砦內的樓宇不知已拆卸和改建了多少次。這些建築商多數都是潮籍人士，正如事頭婆所說他們都是做生意的，只要他們「有銀紙、有人事去識人」就能達成交易。事頭婆說自己「唔識字、唔識嘢，但既然有利益就和他們合作。」這批潮籍建築商把新建的房子都賣給同鄉或同籍貫的人士，所以城砦內潮籍人士便越來越多。

在過去的幾十年，事頭婆看見過城砦內不少人事的變遷。她看見那些身無長物的人搬入九龍城砦，看見他們拼命工作賺錢、節衣縮食，儲夠錢後便搬離城砦，然後空置的房子又被轉賣或租給那些無力支付外昂貴租金的人。城砦對這一羣「過客」來說只是一個臨時的棲身之所，他們甚少預備長住在城砦之中。這對事頭婆來說不免產生一些感慨，因為這地方對她來說並不是一個臨時的棲身之所，而是她的根所在。因為在城砦內有她夫家祖傳的土地，而她亦曾在這幅地上耕種過，或許正因如此，才使她仍然保留著一種鄉民對土地的眷戀之情。今日，她仍以能保存和留守這地方而自豪。

正因為事頭婆對城砦的特殊感情，所以當她見到城砦內充滿黃賭毒等不法的活動時，感受特別矛盾。她既不想搬出城砦，又不想子女學壞，唯一的辦法就是除了上學時間外，都把子女關在家中。寧願抽空帶他們出城砦外玩，都不准他們自己在砦內流連。在城砦的生活中，有兩件事最

能使事頭婆自豪，其一是能留守祖業，另一就是能使自己的子女成材。這兩件事亦似乎就是她過去生活的目標。

三、對未來的期望

對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港府所發佈有關一九九〇年清拆九龍城砵的消息，雖然城砵的居民有不同的反應，但是他們所關注的都是賠償的問題。事頭婆有樓房亦有店舖，清拆城砵可以為她帶來一筆可觀的金錢和一公屋單位，所以她並不需要為清拆後的生活擔憂。唯一令她感到惋惜的是不能再留守祖業。然而，她亦知道這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所以今日她只希望能取得黃大仙或東頭村的公屋單位，繼續和兒子一起生活。或者，對一個大半生生活在九龍城砵的婦人來說，就只有黃大仙和東頭村這兩個地方是她所熟悉的；亦可能就只有這兩個地方能為她保存著過去的一些回憶。

註釋：

- 一 本概論所根據的資料包括有蕭國健的《九龍寨城與九龍城》，九龍城砵街坊福利會碑記，城砵街坊福利會刊物《城寨福利會通訊》（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六日），中文大學幹事會時委會、聯合學生報合辦《城寨內望》特輯、香港房屋委員會一九八七年出版《為九龍城寨居民安排補及安置事宜》。明報一九八三年八月廿日第二版《九龍城寨》。星島晚報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一日第九版《今日的九龍城寨》。一九八八年由三聯書店出版魯金的《九龍城寨史話》。
- 二 作坊指以手工為主之企業，工廠指以使用機器為主之企業。

- 三 由於受訪者不願透露自己和夫家的姓名，所以我們在文中將以九龍城砵居民對她的稱呼定名。
- 四 他們計算菜地的面積是以該幅地每天所需灑水的擔數為單位。

引用文獻

明報記者

一九八三 九龍城寨。明報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第二版。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幹事會時委會、聯合學生報

一九七六(?) 城寨內望特輯。編者自行出版。

香港房屋委員會。

一九八七 為九龍城寨居民安排補償及安置事宜。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城寨福利會

一九八三 一九八三年九龍城砵各行各業統計表。香港：城寨福利會。

梁礎安

一九八四 「比較道教傳統與小傳統中有關節日的觀念。」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四年人類學周特刊，頁卅一卅四。

舒天

一九七六 今日九龍城寨。星島晚報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一日第九版。

喬健、梁礎安

一九八四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五四期，頁一一五—一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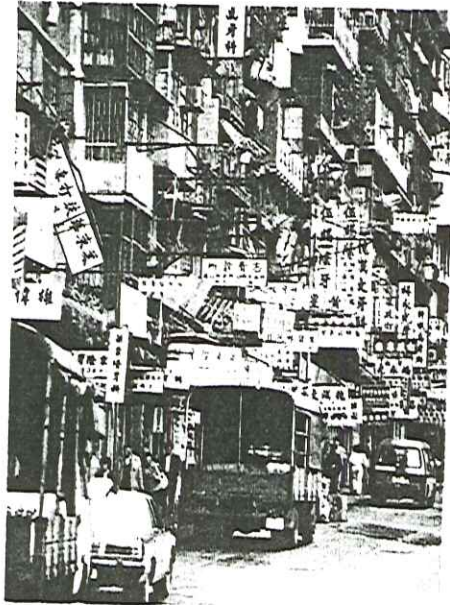
魯金

圖片說明

(1)九龍城砦外貌



(2)九龍城砦近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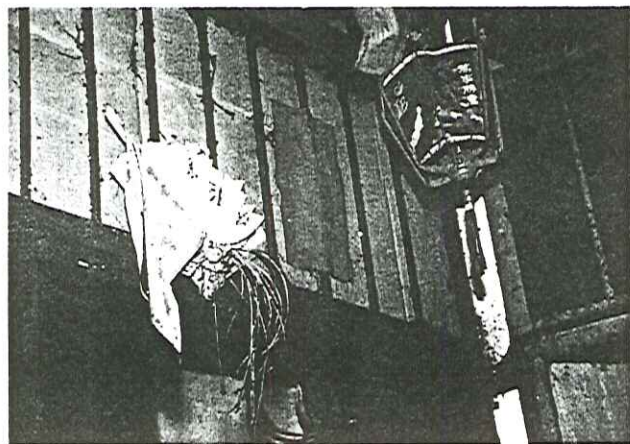


蕭國健
一九八八
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
p.v
九龍城寨與九龍城。油印講稿。

(5)天后古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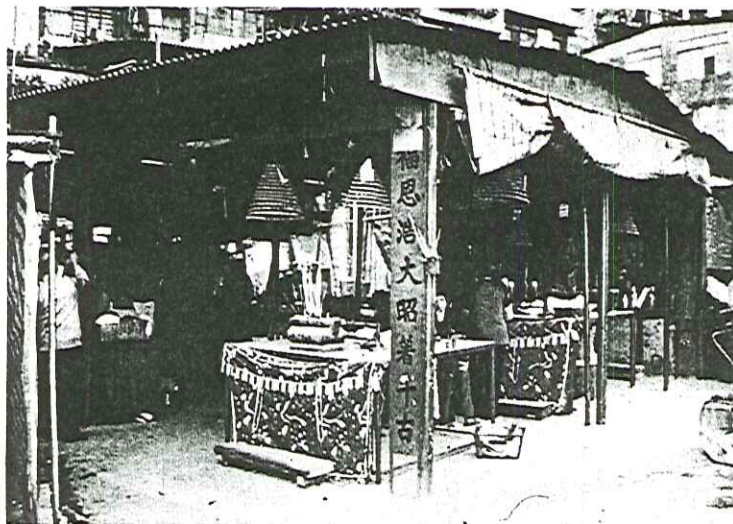
(6)店舖門楣上的燈籠、令旗及紙扇



(3)城砵內一塑膠加工廠



(4)東正道福德古廟



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 / 香港珠海學院, 中國文史研究所
學會主編. -- 臺一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民 81
面 : 公分
ISBN 957-17-0684-1 (一套 : 精裝). -- ISBN
957-17-0687-6 (一套 : 平裝)

1. 中國 - 歷史 - 論文, 講詞等

617

81005144

Poly China C.

AC

150

L74

1992

V2 c1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台一版

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贊助出版費用，謹致謝意

精裝二冊基價 二八·〇〇元正
平裝二冊基價 二四·四四元正

主編 珠海文史研究所學會
發行人 高 本
發行及 新文豐出版 股份 公司
印刷所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三九二八五一六·三〇二三八七〇



版 權
所 有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煩請寄回更換，謝謝！